俄羅斯保守主義及其對外作為的影響

汪哲仁*

普欽（Vladimir Putin）自 2012 年重返總統職務以來，屢屢出招，搶盡鋒頭。在國際事務上，為化解敘利亞化武爭議，他破天荒投書美國紐約時報，成功打消美國出兵的念頭；耗費鉅資營造華麗的冬季奧運，雖遭部分西方人士抵制，但最後也順利閉幕；最近則因併吞克里米亞與暗助烏克蘭東南部親俄民兵抵抗烏克蘭政府軍，而引起美國與歐盟經濟制裁與全球關注。另在國內政治問題上，好幾起法案如反同性戀法、反收養法及「暴動小貓（pussy riot）」審判等，也都因充滿爭議性而佔據國際媒體版面。這些事件都有一個共通點，即係與普欽所信仰的傳統價值觀不合所產生的衝突。在國內事務上，他支持傳統價值，如家庭、反同性戀及愛國主義，認為西方過份強調個人、缺乏秩序、無性別論及忽視生育的自由主義，均有違社會進步動力。

過去兩年來，普欽在若干場合明白指出，保守主義是俄國在現今快速變化環境中生存的要件。這種保守主義雖然根基於俄羅斯傳統文化與信仰，但他強調這並不代表自絕於可以促進經濟成長的新事物與新概念。無獨有偶，今年 4 月初，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Russi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保守主義比十年前更為俄人所接受。過半數約 56％的俄羅斯人認為，保守主義不僅保留傳統和社會結構，也有利於俄國穩定向前，不受干擾。保守主

* 作者為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

airiti

義支持者主要是老年人與企業家，而持反對立場的則以年輕人與職員為主。

俄羅斯保守主義的淵源與意涵

保守主義可遠溯到沙皇時期，其精髓是專制。俄國政治思想一直是側重於強大的、中央集權的，與不受法律與議會拘束的保守主義。任何在政治結構的改變都會導致政權滅亡。俄羅斯早期自由派領導人卡維林（Konstantin Kavelin）認為，在俄羅斯人民心中，沙皇本身就是國家，是仁慈、純善、無私與嚴厲的化身。沙皇是不可能犯錯的，所有的錯誤都是導因於沙皇身邊的臣子。這種政治文化使得俄羅斯人即便是在經歷最艱困期間後的重建之路，第一要務就是尋回專制所帶來的安全感。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沙俄末期短暫且混亂的民主議會政治後，最後卻仍回到由共產黨主導的集權統治老路上。

俄羅斯獨立後的保守主義有兩個敵對的堡壘：親西方的自由派和共產黨控制的左派。1999 年，普欽為挑戰這兩股政治勢力，在飽富自由保守主義精神的《處於千禧年轉捩點的俄羅斯》（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一文中，闡明結合市場經濟與具有俄羅斯特色的民主，俄羅斯才有未來。在經濟上，普欽重用葉爾欽末期的改革派，如庫德林（Alexei Kudrin）與葛列夫（German Gref）分居財政部長與經濟部長之職，實行帶有自由色彩的開放經濟政策，如所得稅制改革（個人所得稅改成單一稅率 13%，企業所得稅由 35% 降到 24%，稅收機構單一化，小額逃稅除罪化等）、農地私有化、中小企業登記與執照發放的簡化與標準化等；政治上則仍遵

行保守主義，強調政府權威，撮合政黨結盟以維持國會穩定；外交上注重維護俄羅斯大國利益。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普欽於該文中強調找回俄羅斯人自古以來就有的傳統價值觀，如愛國主義、強國意識與強大權力的國家機構，因為提升俄羅斯經濟並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這也是政治問題，更準確地來說，是一個思想問題、精神問題和道德問題。此作法異於葉爾欽時期經濟上過於傾向自由主義，而國內政治雖強勢卻又不穩的情況。2001 年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成立後，雖然黨內有不同派系、理念有別，但整體上該黨都被視為中間派。2009 年 11 月 21 日在統一俄羅斯黨的十一屆大會中，該黨主席格雷茲洛夫（Boris Gryzlov）確定該黨的意識形態是俄國式保守主義（Russian Conservatism），其本質是穩定和發展的、沒有停滯與革命但卻又不斷創新的社會，是開放的保守主義。此一時期，新的保守主義基本上已經成為政府施政背後的理論基礎。

隔兩年，統一俄羅斯黨的中央委員會轄下的協調委員會，通過「俄羅斯保守主義：思想和價值觀」，透過這個文件，統一俄羅斯黨試圖向外界提出解決俄羅斯自我認同的歷史難題。自彼得大帝西化運動以來，俄國在自我認知方面，就擺盪在俄羅斯是一個歐洲國家，亦或是一個歐亞國家這種認同的矛盾中。該文件認為俄羅斯的文明與地緣政治讓俄國具有內部的多面性。俄羅斯不單純是歐洲國家或是亞洲國家，俄羅斯除了是「歐洲獨特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外，更是「連結西方和東方的歐亞強國」。由於俄羅斯橫跨歐亞兩大洲的特殊地理位置，保守主義原則除了是全球地緣政治、地緣經濟與地緣文化的穩定力量外，應該當成俄羅斯策略發展的基礎。2009 年俄羅斯提出的「國家安全戰略（Russia's National Secu-

airiti

rity Strategy to 2020)」中，精神安全(spiritual security)被認為是國家安全的要素之一，其體現在外交作為是搭建東西方之間文化橋樑。

除了秉持亦東亦西的歐亞觀點外，俄國保守主義另外一個重要的內涵是俄羅斯東正教文明。在追求俄羅斯國家認同過程中，不管是極右派的帝國思維，亦或認為俄羅斯是一個民族國家，俄語與東斯拉夫族都是「俄羅斯」這個國家元素裡不可或缺的，而東正教則被認為是結合這兩個元素的主要力量。俄羅斯在 1992 年獨立後，東正教很快地恢復它在革命前崇高的地位，俄羅斯人長久以來認為教會是國家利益與國家傳統的保護者。解體後的俄羅斯，政經情勢動蕩，很多人都將教會看法視為依歸。教會的興起也讓多數政治人物將教會視為有影響力的政治組織。東正教除承襲傳統基督教義、強調家庭價值及反對同性戀外，也因歷史上與政權緊密結合而強調愛國主義。按照普欽後來的解釋，蘇聯時期許多社會規範都是抄襲自基督教教義，但是這種基礎在蘇聯解體後遭遺棄，造成精神文明的真空，而新的精神文明基礎卻一直無法自行發展出來。普欽雖然不贊成由上而下來推動國家認同，但是若無精神與文化基礎則國家無法前進。他同意政府應該努力與大眾討論文化政策，提出可行方案，並承認保守主義是他所支持的。

在 2013 年底，普欽對國會發表的國情咨文與一個星期後的記者會這兩個場合中，普欽均引用俄國宗教和政治哲學家別爾佳耶夫(Nikolai Berdyaev)的話明白指出，保守主義不僅不妨礙進步，反而可以防止混亂狀態。他所認為的保守主義是一種進步的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是「我們社會的基本支柱，例如照顧婦孺、保存歷史與成就、維持傳統與傳統

信仰。」就普欽看來，俄羅斯的強大與成長，不能只向遠方的明天眺望而忘了最初立足點，必須以舊有文化和傳統為基礎，才能夠讓俄國真正地、有自信地茁壯；故推動 2014 年為俄羅斯的文化年，希望藉以保存經過幾世紀所醞釀出來的文化根源。

普欽的保守主義維持著傳統俄羅斯保守主義的價值觀，如強調國家利益與強大的國家機構、俄國歷史道路的獨特性、維護現存優良文化。與傳統保守主義的差別是，普欽並不反對改革，但卻不做盲目改革，改革並須考量俄羅斯的國情，這是對 1990 年代俄羅斯激進政治與經濟改革的一個反思。另外一個差異是普欽積極推廣俄羅斯文化，他認為俄羅斯擁有巨大的文化遺產，不僅要保護它，更要在國際市場上把它當作促進俄羅斯商品與形象的一個強大的力量。由此可看出普欽的保守主義也具有其積極的一面。

保守主義興起及對俄外交作為之影響

俄羅斯保守主義的興起，對內有助於穩定統治基礎；對外有利於俄羅斯國家利益，這兩者中間具強烈關聯。例如，暴動小貓對東正教的汙衊行為挑戰了東正教的神聖地位，其審判過程自然而然受到俄羅斯反對派人士如前副總理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烏達佐夫（Sergei Udaltsov）與前世界棋王卡斯帕羅夫（Garry Kasparov）的聲援；而普欽則認為，這些反對派人士在 2011 至 2012 年間的街頭運動又是受到美國的支持與金援。[1] 是故，這種反東

[1] 美國國務卿柯琳頓（Hillary Clinton）多次批評俄羅斯 2011 年的國會

airiti

正教、反政府又反普欽的行為被歸咎於受到西方反俄勢力與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影響。因此就普欽的角度來看，該案正是受到外國勢力支持的一個明證。難怪俄羅斯政治人物批評西方政治人物或媒體常企圖對其社會強加非傳統價值觀。歐美國家強調人權、自由的普世價值，甚至是同性戀的權利，並利用經濟、政治、文化，甚至軍事層面的優越性加強這種普世性。但俄羅斯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認為這些價值應該是建立在符合本國的國情基礎上。面對西方越來越自由與混亂的社會現象，他們認為俄羅斯的傳統價值觀在道德上是優於現代西方所強調的自我差異性，更無法苟同對同性戀的迷戀。

普欽的保守主義在外交政策上的體現是透過宣傳國際法與國際機構來解決國際爭端的正當性，來凸顯美國在小布希時代的單邊主義與其對全球安全的威脅。普欽在 2014 年多次提及，國際事務中的主要參與者必須協調各自的根本利益，自我約束，運用多邊機制來提高國際法效力，並抨擊單邊主義。[2] 因此，普欽認為多極（multipolarity）的國際政治且公平

選舉舞弊，他認為俄羅斯選民應該要求對於選舉舞弊和操縱的全面調查。普欽則認為，希拉蕊的言語煽動俄羅斯反政府抗議人士，且美國花了數百萬美元來影響俄羅斯政治以削弱這個唯一有能力與美國進行核對抗的國家。在該案判決宣布前後，西方政界大多對該案表示失望或關心，其中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法國外交部與法國文化部長費里佩提（Aurélie Filipetti）、英國外交部、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與當時外交部長威斯特威勒（Guido Westerwelle）等人。

[2] 這些場合分別是 5 月 23 日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The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7 月 1 日在莫斯科的俄羅斯全球使節會議（Conference of Russian ambassadors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8 月 29 日在特維爾（Tver）的 Seliger 國際青年研習營、10 月

和民主的世界秩序才是普世價值，才能確保安全與繁榮，必須被捍衛。

俄羅斯近年來在外交上逐漸轉向亞洲，除了中亞與東亞國家外，也將觸角延伸到東南亞。雖然俄外交政策的調整主要是因應國際趨勢變動與維持國家利益，但也存有意識形態的對抗。在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下，俄羅斯政治菁英感受到國內出現越來越多的反對者挑戰其統治基礎，因此必須有相對應的意識型態與之抗衡。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俄羅斯自然而然就與其他具有同樣保守色彩的亞洲文化靠攏，而積極參與亞太事務。例如在俄國文化中，東正教的價值和國家權威高於個人權利，這點與伊斯蘭文化或東亞的儒家文化非常類似，且在政經利益與文化類似性的推波助瀾下，彼此關係發展非常迅速。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在 2008 年 3 月在達卡舉行的伊斯蘭會議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簡稱 OIC）年會上，推動組成「俄羅斯 - 伊斯蘭世界戰略願景小組（Russia-Islamic world Strategic Vision Group）」。他表示由於俄羅斯具多宗教的本質，比一些歐洲政客故意挑起伊斯蘭恐懼症，更能尊重不同文化和宗教傳統，而國際事務上也更具合作的空間。於是雙方開始合作，聯手在聯合國安理會設立宗教諮詢理事會（Advisory Council of Religions）。雙方自 2009 年起，固定在

24 日在索契（Sochi）的「瓦爾代會議」（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雖然普欽如此明白表示尊重國際法，但實際上他在烏克蘭事件中，並無意完全遵守國際法。所以在烏克蘭事件中，普欽不敢明目張膽地出兵烏克蘭，而是採用派出身著無徽章部隊來幫助親俄民兵。很顯然地，普欽強調國際法與國際機構解決爭端僅僅是反對美國單邊主義來維護俄羅斯自身利益。

airiti

喀山舉行高峰會；另於 2013 年簽訂合作協議框架。該框架包含政治、經濟、社會與科技合作，並舉行定期諮商。俄羅斯外長在 2013 年 1 月 23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解決伊斯蘭教派間的衝突需要透過與阿拉伯聯盟與 OIC 的合作。由於俄羅斯在中東有核能與武器的利益，中東地區又是國際問題重心與恐怖分子活動的要地，透過與 OIC 的合作，可以提高中東地區的穩定，有利於俄羅斯維持其利益，並增進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的發言力量。另外，透過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簡稱 SCO），俄國、中國大陸與中亞回教國家在反恐與軍事領域緊密合作，2014 年 8 月舉行的和平使命 2014 是 SCO 有史以來最大的軍事演習。俄國與中國大陸是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雙方的合作更如火如荼擴大中，除在經濟、金融、軍事、能源與地緣政治等方面之合作外，雙方在科技、文化交流與合作頻繁，雙方互辦國家年、語言年與旅遊年讓雙方的合作在文化層面向下紮根，甚至連普欽女兒也學習中文與中國武術。

在烏克蘭危機中，同樣價值觀衝突也扮演一定角色。雖然本質上，大國間的角力是這場危機的原因。但烏克蘭東南部的親俄人士常常將歐盟描繪成一個以同性戀權利為重點的社會體制，並認為歐盟未來將強迫烏克蘭人接受此種社會制度。這種偏頗觀念的流傳，強化了烏東親俄民兵對抗基輔政府軍的道德正當性。

俄羅斯的亞太政策在危機中之運用與後續觀察

近年來面對歐洲經濟的衰退與因敘利亞、伊朗導致中東不穩，俄羅斯在亞太地區已早有佈局，因為這是全球經濟成長最

強的地區，而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也是普丁口中的本世紀的全國的優先發展地區。除上述提及俄與中國大陸關係的全面大幅增進外，與日、韓兩國也有能源合作。2011 年，俄羅斯正式參加東亞峰會，拉夫羅夫外長把該峰會稱為「通向亞洲的窗口」。但在烏克蘭危機之後，俄羅斯無論考量戰略安全或經濟領域之重要性，均刻意強化亞太關係在其外交作為上之比重。俄羅斯與日本今年重啟副外長級的和平條約談判，以解決北方領土爭議問題，俄羅斯的政策雖然沒有大幅改變，但立場已較為軟化。在 10 月協助北韓興建俄朝鐵路，並希望興建通過北韓向南韓輸送天然氣的管道；11 月底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崔龍海出訪莫斯科，這些跡象顯示俄羅斯希望擴大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同月俄羅斯與越南簽署協議，簡化俄軍艦在金蘭灣停靠手續。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PEC）上，俄羅斯又與中國大陸簽訂了年供氣規模為 300 億立方米、期限 30 年的新合約。以「保守主義」為外交政策中心思想之俄羅斯，顯然在此區域已先馳得點。難怪在亞太經合會前，俄羅斯駐華盛頓大使基斯耶克（Sergey Kislyak）即明白指出：「你們（美國）正將重心轉移至亞洲，但我們（俄羅斯）已經在那裏（亞洲）」，而這也是俄羅斯在遭遇烏克蘭事件因歐美所帶來之危機與威脅感，所表現出之反射動作。

觀察俄羅斯短期內之危機處理，應以緩和與歐美關係及復原國內經濟為先。俄與美歐因烏克蘭事件而互採經濟制裁，雙方關係陷入谷底，俄羅斯經濟也面臨停滯、甚至衰退的危機中；故未來一段時間內，雙方在意識型態的僵持下，雖仍將處於對抗的局面，但在程度上會相對和緩。但長期以觀，為尋求一個長久對抗北約與美國的有力支撐，同時確保

airiti

其經濟穩定發展，俄羅斯的外交策略將更為東傾亞洲，以「遠歐美、親亞太」之策略原則，謀取「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之雙重保障。

分析俄羅斯近年來亞太版圖之配置，除強調與中國大陸及印度兩國在其外交之優先性、加強與越南、兩韓之雙邊關係外，另亦加重其於中、印、俄三邊會談及 SCO 多邊機制之協調及主導角色，積極參與 APEC 及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 ASEAN）等亞太區域性組織及對話；以上雙邊、多邊及區域合作之多軌道運作模式仍將為俄羅斯所持續運用。至於合作重點自然仍以「軍事」及「能源」為主軸，而放眼未來 20 年唯一可與美國相互抗衡之中國大陸，則為俄羅斯亞太政策甚至全球戰略之重中之重。

最後，除非俄羅斯與美歐間的猜忌與排擠能冰釋，否則保守主義在普欽剩下四年任期內仍將佔據其國內外政策的理論核心。普欽重提保守主義並非僅出於個人的喜愛或是俄羅斯優良傳統遭到遺忘，而是俄羅斯保守主義是一百多年前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對於國家前途深思熟慮下的產物，雖然部分思想可能過時，但卻對俄羅斯當今國內外的情勢深富啟發性，或許可能提供一個解決之道。透過保守主義的作用，在俄羅斯與美國和歐盟抗衡與制裁情況尚未改善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也將同樣地維持向亞洲傾斜的走向，這種走向除了經濟與政治的考量外，也是文化上的相互吸引。